



政府

中国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高民政 / 主编

与

政治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黄河出版社



D 62-0
1

87619



高民政 / 主编

与 中国政府
政治

黄河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中国政府与政治
高民政 主编

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625 印张 574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 册

ISBN 7—80558—366—8/D·62 定价:20 元

DG78/01

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

——《中国政府与政治》序

王沪宁

读了高民政同志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颇为兴奋，亦颇得启发，觉得他们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乃至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关于当代中国政府和政治的著作，一向是中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薄弱之处，建国以后四十年中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在1949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全新的政治体系，是开天劈地的事情，但由于种种缘故，理论研究却一直没有跟上。近年来，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和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版了几本有关的著作。但是，相对于错综复杂的和庞大的中国政府和政治来说，还是很不够的。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一样，只有研究的成果达到一定的规模时，才能有质的突破。因此，对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来说，研究的成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本《中国政府与政治》的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想作个推荐。

这本《中国政府与政治》内容广泛，结构完整，涉及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国家结构，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事制度，人民武装力量，基层群众自治，社会团体，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地方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和港澳台政府等内容，论述了中国政府和政治的基本重要方面，展示了中国政府和政治的概貌和特征，是比较系统、全

面的著作。

这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相比，有其独到之处，我想在这里提示几点：①论及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在社会动态发展中的态势，不是仅做静态的描述，而是把中国政府与政治放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洪流中去加以透视，展示了趋向，如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析等；②作为以军队的作者为主而撰写的书，他们发挥了优势，比较注重叙写与国家武装力量有关的章节，如对人民武装力量的分析，是同类著作中最为系统和详细的，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考察一国的政治应当注视之，不然不能通达，这本书在这方面是独树一帜的；③包括了港澳台的政治机构与政治的情况，这符合中国政治九十年代的发展趋向和“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上仅为此书最突出的三个特点，其他特点就不在此一一撮举了。

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关系到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政治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加强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使中国政治学能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现象作出权威性的分析和描述，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合理的、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的作者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书虽然是规范性的，但有关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许多重要的课题已包含在里面。这里，我想就这些问题进行一点发散性的思考。

跨入变化多端的 90 年代，预示着人类跨入了又一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一个世纪的历程是漫长的，此刻却显得短暂和急促，因为二十一世纪就在眼前，喷薄欲出，而二十世纪却给人们留下了种种难题和挑战。每个社会均有自己独特的课题，人类也有共同的问题。这些课题和矛盾构成世纪之交迫在眉睫的压力，人们

大概不能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中使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但人们至少希望找到在下一个世纪解决所有积累下来的难题的方向。这就是世纪之交人类智慧面临的总体挑战，也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总体挑战。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把本世纪最重要的变革力量确定为知识，他说新知识倾覆了人们已知的世界，并且推倒了它赖以支撑的“权力支柱”，现在所有的人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①。知识可分为科技知识和社会知识两大部分，在本世纪，科技知识成为改变既成社会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但社会知识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纵观历史，社会知识历来均是社会变革重要的催化剂，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均可证明此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曾导致了三场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模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理论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产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世纪之交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求人们在多种方面作出应对，也要求社会科学作出应对。政治研究作为研究社会政治权威、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学科，自然不能例外。

中国政治研究能不能在世纪之交有决定性的发展？能不能放出异彩？能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是人们百般思忖的一些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应当先来看一下中国政治处在怎样的战略态势下。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新战略态势下，这一新战略态势由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现代化被确定为中国的总战略目标；二是社会结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进步下发生战略转变；三是作为外部环境的国际战略格局出现剧烈演变；四是综合国力竞争形成国际竞争的新战略重点^②。新战略态势的四个

① [美] 阿尔温·托夫勒：《权力变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423页。

② 见王沪宁：《中国九十年代的战略抉择：体制驱动》，《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

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均向政治研究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它们规定着我们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政治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

政治研究的地位和重要性受新战略态势的决定，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把中国社会在世纪之交的变化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中国从拥有有限的能量向拥有巨大的能量转变；②中国从面对天然的自然向面对人化的自然转变；③中国从介入狭窄的世界向介入开阔的世界转变；④中国从选择一元的价值向选择多元的价值转变；⑤中国从建立垂直的结构向建立弥散的结构转变；⑥中国从置身稳定的格局向置身变动不居的格局转变。这些归纳均为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归纳，隐去了栩栩如生和波澜壮阔的实际运动过程和各种力量的汇集，但它们可以为人们思考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广阔的背景。这六个方面的变化可以说是任何社会可能遇到的最深刻、最蓬勃、最富有冲击力的变化。在这样六大方面变化的冲击下，社会政治体系必须与之相应，不然的话便不能指导社会。这一态势决定我们政治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就是为完善和发展社会政治体系而努力。

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 在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态势下，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便是顺应社会现代化的走向，研究和构筑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模式，使之能够卓有成效地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保证社会目前和将来的繁荣昌盛、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也就是在恩格斯所讲的作用与反作用

^①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的逻辑关系中梳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且是一种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构筑。

二

任何社会科学的发展均离不开社会本身的发展，离开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血肉联系，社会科学的发展便会丧失生命力。政治研究也一样，离开生龙活虎的现实的政发展也会失去生命力。政治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学科，这一层逻辑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必然。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发轫较晚，虽然古代有丰富的政治论述文献，但被认为不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其实这一划分标准是以西方政治学为标尺的，其间东西方历史—社会—文化的差异被忽略不计。讲到东西方政治研究的差异，我把它们归纳如下：东方范式单一，西方范式多样；东方注重世事，西方注重逻辑；东方强调布政，西方强调建制；东方侧重伦理，西方侧重法理；东方科界模糊，西方科界清晰。这些差异并非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陶冶和积蕴起来的。不少学者认为此乃中西文化差异酿致。如陈独秀提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①梁漱溟则相信“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②由这种文化进而导致中国政治研究讲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体说来注重从内心超升达到政治修明，并在这个理论结构上催生出传统的政治体系模式——君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主集权体制。而西方政治学从亚里士多德起就较注重人性、体制、权力、规范等问题，渐次形成超伦理的法理体系，近代以后则更强调制度、规范制约政治关系，逐渐使政治关系脱离伦理关系，发展出一套外在于人的政治体系模式——资产阶级代议民主体制。应该说，从近代发展的视角观之，代议民主体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的政治胜利。而在中国这一过程没有完成，或者说还没有完成便被西方的炮火打断了。历史不能回头，因而不能说倘若没有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政治会或不会走向西方式民主政治。有此可能性，但无必然性。正因为西方政治研究借助了这一历史落差，结果被当作了坐标体系，使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悠然变得暗淡了。自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态势便成为主流。中国政治学发展总体上向西方范式靠拢，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总体处在法学世界观统摄之下，1949年之后一度中止了政治学研究，直至1980年才恢复。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当通观历史，比较中外，确定前述中国政治研究发展的方向。

政治研究之发展依托于现实政治之发展。西方政治学之所以有时间的绵延和空间的广延，主要原因倒是平凡而简单的，这就是它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设计并构筑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系模式，政治体系模式带动政治学。中国政治研究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扩张力，它也造就一种政治体系模式，并借力于它。只是当这种政治体系模式在近代被历史超越了之后，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才中衰了。由此可见，政治研究和任何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与其对象和对象化的存在互相借力，使两者均不为历史所超越。可以相信，当西方现存政治体系模式被历史所超越时，其政治研究也将随之跌落，当代西方政治研究的种种危机便是症候。所以，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研究发

展的方向便是设计和构筑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我们应当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担当重任。

这里提出的基本命题是：政治研究要构筑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而非西方式的政治体系模式，不然的话，不能大有作为。提出这一命题的理由是：①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历经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漫长的历史塑造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传统等的特殊结构，不同于西方社会，这决定着其政治体系模式应当有自己的特点；②中国奉行迥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总体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这两大理论体系均源自十九世纪中叶，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哲学观、世界观、社会观、政治观和历史观，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取向不同；③中国形成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同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关系不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关系，这要求有不同的政治体系模式来吸纳和梳理；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不处于同一层级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向社会政治调控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应通过不同的程序表现出来。

三

完善和构筑中国社会的政治体系模式的总则是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此乃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政治弊病——形式民主和实质不民主。我们需要研究发展的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既是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最好体现，又成为社会发展有效的调控机制，这就是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主体内容。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是绝大多数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它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要

民主百万倍^①。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一种民主原则，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体现出来，二是它在不同的国度里可能具有不同的特质。在研究和发展完善的民主政治模式时，自然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特点结合的问题。我这里说的是，在现有民主制度的水平上向更高层次进展，在既定原则基础上向建立完整操作体制进展。这样的话，研究中国政治至少要研究并确定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在这五项条件下民主政治的操作机制。

1. 超大社会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超大社会指中国社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型社会，主要表现在其最大数量的人口规模上。不言而喻，民主政治首先是全体公民参与的一种政治，其次也是对全体公民实行调控的一种政治。因而它的存在和运转与人就须臾不能分开。在政治学上，历来人们就有一个理论悬案，这就是大国是否适宜于民主政治。孟德斯鸠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选择，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因为历史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体认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令人们不折不扣地选择民主政治。余下的问题是如何在超大社会中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超大社会不仅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折射出错综复杂的政治、行政、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为民主设定了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心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等方面的难度。可以说，解决超大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将是中国政治学的一大贡献，因为西方民主大都是中小国家的组织机制，美国算其中最大的社会，但它调控的社会仍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各国的政治体系模式对中国的

①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34页。

②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6页。

意义有限，无论从原则层次上讲还是从操作层次上讲，原因就在于此，更不去说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小型社会。

2. 一党执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其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其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力量总和，决定中国应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才能稳定和快速发展。在目前阶段，统一的政治领导不仅表现为政治权威的统一性，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政治领导集团的统一性，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在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下如何建成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是中国政治研究面临的又一任务。众所周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在于其多党竞争的体制，马克思早就鞭辟入里地分析过，这样的政治竞争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种利益分化的，有利于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各种不同的利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利益对立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虽然有不同的利益倾向，但本质不一样，这就是说一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西方式民主，必须由我们来研究和发展的基本原则、程序和规范。这里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政治民主、党政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课题。应当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如“文革”的发生就与一党执政的民主政治不完善有关，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同样的缺憾。

3. 公有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历史上和现存的大多数民主政治形态均为剥削阶级的政治形式，同时大多数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是与私有制的要求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因此问题很清楚，与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绝不能简单地搬到公有制的政治形式上，况且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设施有些不适应于公有制的政治形式，有些它根本没有。公有制向民主政治提出新的课题，如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生产资料由谁来掌握并运用？各级作为社会财产所有权代表的管理主体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如何？政治调控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一般公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关系如何？公有制条件下不同的利益倾向如何体现和被代表？如此等等。这样一些课题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来解答。从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4. 社会资源总量有限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资源总量相对来说是贫乏的，超大社会决定了这一特点，富集的资源经庞大的人口一平均就显得相对贫乏。这一基本国情也向民主政治体制提出设定。政治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发展的产物，政治发展不能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历史表明，在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条件下建立民主政治并非易事，往往难以成功，如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模仿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很快就土崩瓦解，或形同虚设。而有些形式上维持住西方体制模式的国家都陷入了动荡、混乱和不稳定的泥潭。对于这些历程，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记取。中国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必须对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设定作出考虑。在这种客观制约下，会有政治机制与程序、权威与服从、公民的地位和权利、政府的作用和管理、资源分配的权力和职能、正义和自由、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的课题提出。我们要研究这些课题，作出科学的解答，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发展之必须，也可构成对世界政治学研究的贡献。

5. 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任何社会均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体系模式及其发展道路。政治体系模式植根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深厚土壤，不能随心所欲地移植，正象美国的总统制不能简单地移入英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不能移到法国去一样，西方历史上渐渐形成的政治体系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移入东方社会。即便在一定的形势下被移植了，也会变形，如二次大战后在美军的刺刀下日本被移入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很快它就变成了一种不西不东的形态，其基本精神依然是日本传统价值。从这点出发，可以得到一个看法：一般认为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

为基础，在商业精神鼎盛的气氛下发展出一种民主形态，可称之为法理民主；而中国社会历来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是商品经济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社会政治文化更多侧重社会各种伦理关系，权力关系的调整更多依靠道德教化，是谓“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之差异。^①中国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恐不能置此不顾，单纯依靠法理原则来构筑恐不能适应，会有政治上的水土不服。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构筑伦理民主的政治模式，同时借鉴法理民主的合理成分。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下不能不走的发展道路。法理民主本身有种种弊端，已经达到极点，克服它们的手段在法理原则之外。我们若能在法理民主之上构造出新型的民主体制，无疑是贡献。

四

构筑政治体系模式，往往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价值层次的理论，一是操作层次的理论。价值层次的理论确定政治体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取向，操作层次的理论将价值层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步骤、程序和规范，使价值层次的理论得以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运行。这两个方面的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原则层次的理论，政治体系模式无法构筑，等于建筑物没有总体设计思想。没有操作层次的理论，政治体系模式无法有效运转，等于蓝图没有变为实物。因而，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研究还面临着从上述两个层次来构筑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任

1. 在价值层次的理论作出确定论证。可以说，价值层次的问题总体上已经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当在政治领域全面贯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政治应当扬

^① 见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载《王沪宁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8—155页。

弃资本主义政治，走向更高的政治形式。不过，在这个总前提下，人们还是面临着进一步拓展价值层次理论的任务，这包括三个方面：①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理论，确定其总体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总方向和总原则，这是明确无误的。然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应当不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进政治发展。马恩没有集中讨论未来社会的政治发展问题，这为当时的条件所不允许。马恩设想未来社会政治将消失，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都是在生产力不那么发达的社会中取得胜利，国内外环境使其政治格外复杂。这要求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推演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如社会政治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原理，政治权力反作用于社会的原理，对人的管理将变为对物的管理的原理，把权力交回社会的原理。马克思曾提过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共和国”，^①那么在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其基本原则又应具体化为什么呢？怎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提出未来社会发展的社会原则、民主原则、经济原则、议行合一原则、公仆原则、自治原则、代表原则、相对集中原则、统一原则^②，这些原则又如何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体现出来呢？这些均是需要加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应当成为构筑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的基本原则。②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再生，取其精华揉和进政治体系模式。任何政治体系模式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后者会明显地或潜在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不能将它挥之而去，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应当对其加以扬弃。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模式离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

② 同上，第372页

开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能造就。传统政治文化确有其弊端，精华部分也不能否认，对其核心价值和原本精神可以做创造性再生的催化。从传统文化中发凡出中国政治体系模式的一些基础观念将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贡献。③批判吸取域外政治体系模式的原则，形成中国政治体系模式与各种合理因子的有机组合。在中国政治体系模式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还应该批判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政治体系模式的合理成分。西方国家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制衡等，也并非资产阶级的独家创造，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长期努力的共同成果。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借用了这些原则的形式来实行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批判资本统治时并不是说这些原则不对，而是批判资产阶级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性和虚假性，因而要通过社会革命来保证这些原则的真正实现。我们应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深化对这些原则的认识，扬弃资产阶级附加上的不合理性，把它们置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之中，使它们成为中国政治体系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在操作层次理论上作出系统规定。从操作层次的理论来看，涉及的内容多且深，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之中，包括政治体系总体结构、政治体系功能结构、中央和地方关系、决策机制和程序、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等等，均有一个优化的过程。没有这些具体制度的完备和系统化，完善的政治体系模式无以构成。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我非常感谢本书的作者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对中国政治研究发表一点看法。谈到这一题目，我感到激动。世纪之交的时刻正在我们面前，这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深信中国政治的研究只要把握好时机和条件，就能够大有作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已在呼

唤我们作出自己的贡献，新战略态势的格局要求中国的政治体系能够在动荡多变的局势下“胜似闲庭信步”，中国的社会特质和历史文化特质都准备了条件。《中国政府与政治》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开端，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向未来。让我们从这个开端起步。